

跨越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鸿沟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评介*

孙德刚

摘要 遏制战略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冷战起源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一书试图打破上述两大学科门类之间的藩篱,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地提出遏制战略的基本理论假设,归纳出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框架,并通过解读“长电”和 NSC-68 号文件等档案文献,对遏制战略理论假设加以检验。该书发展了当代冷战史研究的四大学派——“传统派”、“修正派”、“调和派”和“国际派”,成为哲学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 遏制战略 冷战起源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12 (2009) 03-0073-78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包括乔治·赫林(George C. Herring)所著《援助俄罗斯,1941-1946:战略、外交与冷战起源》^[1];拉夫·利弗林(Ralph B. Levering)所著《冷战起源论争:美国与俄罗斯视角》^[2];罗伯特·波拉德(Robert A. Pollard)所著:《经济安全与冷战起源,1945-1950》^[3];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所著《破碎的和平:冷战起源与国家安全态势》^[4];汤姆斯·帕特森(Thomas G. Paterson)所著《冷战的起源》^[5];马丁·麦考利(Martin McCauley)所著《冷战的起源》^[6]等。从研究机构来看,美国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1995年成立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英国伦敦大学成立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以及我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均对冷战的起源作了较为深入地文本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曙光教授(以下简称张教授)新作《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以下简称《再探》)则从一个独特视角对冷战起源作了全新解读。

一、理论假设的提出

《再探》第一章为理论研究部分,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冷战、战略和遏制三个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张教授将现行的国内外冷战史研究归为四大类——“传统派”、“修正派”、“调和派”和“国际派”,认为“传统派”从国际体系的转换和权力转移视角探讨了英、法、德、日、意的衰落和美苏的勃兴对战后两极格局的影响,并认为美国凭借战争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对抗苏联的扩张,冷战史就是“理性”的美国应对“非理性”的苏联的“威胁——反应”过程;“修正派”在对“传统派”加以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冷战的爆发是美国“非理性”对外政策的结果,美国垄断寡头的经济利益需要、美国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以及推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等都诱发了冷战的爆发;“调和派”则

*本研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项目编号:B701)和国家“211工程”3期“中国特色阿拉伯学—中东学建设”项目资助。

试图走“中间路线”，认为“传统派”和“修正派”都走了极端，偏离了事实，美苏两国决策者都应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国际派”（“新冷战学派”）则认为，上述三个学派都未能避免冷战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价值观偏见，学者不仅需利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而且需利用俄罗斯、东欧以及中国等“对方国”的档案文献。^[7]

在文献综述中，张教授发现：目前关于冷战及其起源的四大研究学派均存在严重的“重实证、轻理论”、“重描述、轻分析”、“重史学、轻跨学科”等问题。由于外交档案中的绝大部分事实上都已经被销毁，且核心内容至今尚未解密，加上当事人回忆录常夸大个人的“丰功伟绩”，因此历史学家根据现存的解密材料和回忆录很难做到还历史原貌。在现实当中，自誉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国际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史学家则以国际政治学家数理推导出的理论模式和逻辑演绎出的理论框架经不起历史检验为由，亦采取漠然态度，两派似乎“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歧加大，双方在很多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如冷战的起源问题上交流甚少，最终形同陌路。^[8]

为解决上述问题，《再探》提出大胆设想——冷战史研究需要有“新思维”，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该书在继承冷战史研究的“四大学派”基础上，打破了学科之间条块分割的藩篱，体现了冷战史研究的第五种学派——“统合派”，将“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和“国际关系历史实证”相结合，借用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概念，提出理论假设，并用解密档案文献为实证内容，检验理论假设。“统合派”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创新，不如说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它试图以国际关系理论去解读历史事件，并通过历史事件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真伪，这是《再探》的最大亮点。

《再探》认为，冷战的起源与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出台几乎同时发生，并认为国家安全战略^[9]具备以下六个基本特征——时间向度的长期性、政策涵盖的整合性、政策体系的稳定性、政策内涵的可操作性、政策外延的模糊性和政治动员的功能性。国家安全战略是主体的人（包括决策精英、决策机构、智库）对客体（国家需要）的反应，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可分为战略思考、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三个过程。^[10]以往史学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决策的结果而忽视了决策者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制定过程，这是此书的又一亮点。

美国对苏冷战通过安全战略体现出来，而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是遏制战略，它由一系列思辨点组成。第一个思辨点是对战略对手根本意图的判断，亦即对手具有长期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在特定范围内不间断地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扩张之意图、能力和行为；第二个思辨点是对对手扩张意图而造成威胁的认知；第三个思辨点是对战略应对的多项选择，而这一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战争政策、绥靖政策和观望政策。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遏制战略的内涵分别是围堵（Encirclement）、威慑（Deterrence）、胁迫（Compellence）、预防（Prevention）、先发制人（Preemption）和解放（Liberation）。^[11]其中，前两项属于消极遏制战略，后四项属于积极的遏制战略。

《再探》在重新解读冷战起源时系统地提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假设：1、冷战是一种以国际安全或冲突解决为主轴、并以权力平衡为动力的大国国际关系“对冲”的系统；2、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思维、逻辑、认知与话语，而正是由于这个意识体系使得冷战不仅持续地主导着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而且渗透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3、冷战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核武器的出现和继之而来的核军备，使得大国权力的运作、安全利益的确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战略资源的积累发生本质变化。^[12]上述三个

理论假设涵盖了冷战研究的三个层面，亦即权力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与核武器因素是影响冷战爆发与运行轨迹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动因。

二、“长电”与有限遏制战略构想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遏制战略理论假设，《再探》第二至第八章分别利用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文献，探讨美国遏制战略的思考、制定和执行过程。美国决策者对遏制战略的思考源于凯南的“长电”，凯南的国家利益观和威胁认知观最终影响了杜鲁门政府的对苏遏制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凯南认为，现代国家实力的核心是工业制造能力，战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苏联构成了世界上五个工业中心，其中美国及其盟友囊括了四个，共产主义集团仅控制了一个——苏联。^[13]只要将苏联遏制在一个经济中心的范围内，阻止日本或联邦德国沦为其势力范围，就可以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凯南主张对苏联采取有选择的遏制，并将美国的战略地区分为 A、B、C 三类，A 类是大西洋地区的国家与疆土，包括加拿大、格陵兰岛、冰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瑞典、芬兰、挪威）、英国、西欧、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等）、摩洛哥、西部非洲以及南美部分地区；B 类是地中海国家以及中东；C 类是日本和菲律宾。^[14]《再探》基于“长电”的文本分析，得出三个结论：1、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要求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手段；2、遏制战略要求美国摒弃美国国家利益“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幻想，回归“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现实，对苏联威胁的长期性和严重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3、美国需依靠军事实力和经济杠杆，构建反苏同盟体系，构建全球均势，积极应对苏联的威胁。^[15]

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的谋划者，杜鲁门是遏制战略的执行人。美国大张旗鼓地阻止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手，并在欧洲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体现了凯南提出的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围堵苏联的地缘政治思想，亦即美国以盟友为“堡垒”，以岛屿为“锁链”，以西欧和地中海北部为重点，以“中心地带”（Heartland）与“边缘地带”（Rimland）为理论，以“楔子外交”为手段，分化苏东阵营。杜鲁门在制定遏制战略过程中还运用了凯南遏制理论，推行了遏制苏联的亚洲战略，并参照了三个坐标：1、苏联与亚洲大陆的联系，亦即莫斯科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短期内控制欧亚大陆的可能性不大；2、亚洲大陆的军事工业能力不强；3、亚洲大陆并不同时具备威胁美国的双重条件——能力和意图。因此，杜鲁门尽管意识到苏联可能会在亚洲扩大影响，但又认为亚洲大陆是累赘而不是资产。^[16]杜鲁门与凯南的遏制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双方都基于一个主要判断：苏联仍未准备好通过军事手段推行对外扩张，因此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对苏遏制战略带有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某种惯性。

为什么美国在随后两年中加大了对苏遏制力度、甚至遏制战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再探》第四章通过分析解密档案后发现：1948 年 2 月捷克政变事件和当年 6 月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彻底打破了杜鲁门对苏的最后幻想，使美国的有限遏制战略（选择性遏制战略）升级为全面遏制战略。1948 年 6 月 26 日，在一份关于美国对西欧军事援助的绝密政策报告中，国务院要求将“推动美国尽快加入一个欧洲军事同盟”列为 1949 年美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当时苏联在中东欧部署了 30 个正规步兵师，而美英法兵力总数不满 10 个陆战师。^[17]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威胁呈逐步上升状态的基本判断促使其最终选择结盟外交，放弃传统的孤立外交。正如摩根索所说的：“那些将华盛顿告别演说词（孤立外交）视为教条的人所犯下的错误不亚于完全背离华盛顿演说词所犯下的错误”^[18]。1949 年 4 月北约的成立就是杜鲁门政府对美国传统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底线的最后突破。

1949年底,杜鲁门政府还突破了凯南有限遏制战略的底线,在地缘上将遏制苏联的范围扩展至亚洲,拉开了亚洲冷战的序幕。凯南此前只是将日本和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之锚,但杜鲁门和艾奇逊却于1950年1月宣布构建东亚“环形防御圈”,包括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菲律宾以及关岛等,麦克阿瑟甚至提出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英属、荷属岛屿纳入其遏制苏联的范围。1949年底,保罗·尼兹(Paul Nitze)接替凯南,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一职,标志着凯南有限遏制战略的终结和全面遏制战略思想的酝酿。但无论是凯南的有限遏制战略,还是麦克阿瑟或尼兹的全面遏制战略都未将中国台湾包括在内。^[19]

三、NSC-68号文件与全面遏制战略的酝酿

《再探》第五章分析了美国全面遏制战略思想的根源——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1950年4月由尼兹主持成稿的此份文件成为美国战略制定前所未有的“创举”。NSC-68文件强调:在过去35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全球战争,也见证了两次波及范围广、强度大的俄罗斯和中国革命;五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消亡;两个帝国主义体系——英国和法国的彻底衰败。^[20]由于美苏代表的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意识形态,双方的核心利益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属性。NSC-68号文件强调,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不仅针对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也针对民主国家用于保护这些价值观存在环境的物质能力,因而这是个同时包含了战争与和平的挑战。《再探》第五章的重要发现是:美国除以意识形态为界定坐标外,还以苏联对外威胁的能力分析对外威胁的意图,认为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确保了莫斯科能够有效调度战略资源,形成巨大潜能。NSC-68号文件呈现出至少三个思维误区:1、将威胁与利益的考量顺序颠倒,以威胁确定利益的空间;2、将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致使威胁的内涵与外延充满不确定性;3、将苏联制造战争的能力作为其发动侵略意愿的充分条件,忽略了能力与意愿并非总具有因果关系的可能。^[21]

比较凯南的“长电”和尼兹的NSC-68号文件可以看出,二者均对苏联的威胁表现出忧虑,但是前者保持了谨慎的乐观主义,认为苏联尚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与意图;后者则表现出严重的悲观主义,认为苏联的集权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其最迟在1954年必然会对外发动战争。为此,《再探》第六章深入分析了NSC-68号文件试图影响杜鲁门政府、要求其摒弃凯南提出的“有选择性”、“突出重点”的遏制战略,转而选择全面和无差别的遏制战略。全面、无差别的遏制战略不仅要求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全方位遏制,而且要求美国在可动员的战略资源上做出多方面、多层次的配置。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求得国际关系结构的稳定,而且通过威慑与胁迫形成“对抗心理优势”。^[22]

四、全面遏制战略的实施与绩效评估

全面遏制战略能否付诸实施?《再探》第七章分析了全面遏制战略的资源配置要求,包括美国所拥有的必要政治资源(盟友和准盟友)、经济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和对外援助)、军事资源(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数量与性能)。NSC-68号文件信奉凯恩斯经济学^[23],认为在全面遏制苏联过程中尽管可能出现财政赤字,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建设项目与物品采购会拉动经济增长,此过程中获得的税收会抵消财政赤字。^[24]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对全面遏制战略绩效的最好检验。受尼兹等人思想的影响,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执行了全面遏制战略,包括出兵朝鲜半岛、派出第七舰队中立台海,在共产主义势力影响的最前沿明晰地划出

一条线，并试图将共产主义势力推回到朝鲜半岛的最北部。《再探》认为，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不应停留在“错误战争”这一表层，而应当从中洞察 NSC-68 号文件对美国全面遏制战略行为的影响。首先，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完全出于杜鲁门政府在 NSC-68 号文件思想框架内对共产主义威胁放大化的误判；其次，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行为受制于 NSC-68 号决议的错误逻辑——冷战对抗中任何一地的丢失都是对全线的重创；再次，尽管 NSC-68 号文件主要由国务院文官撰写，但全面遏制战略思想的制定和执行体现了白宫同五角大楼之间的权力争斗；最后，美国出兵朝鲜、收复失地反映了非理性的“军事浪漫主义”的影响，麦克阿瑟自称懂得东方心理学，坚信“武力是使他们屈服的唯一办法”^[25]。

《再探》最后回顾了冷战史研究的四大学派对美国全面遏制战略的分析，认为 NSC-68 号文件和美国的遏制战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该文件是美国遏制战略的总文件，其核心部分是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因此凯南、艾奇逊、约翰逊和尼兹的认知心理值得学界的注意；第二，美国的战略文化对该文件的核心思想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对美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26]；第三，该文件本身具有“话语分析”的意义，塑造了美国的“冷战观”，通过话语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的遏制战略今后值得大胆尝试。^[27]《再探》结论部分还论述了美国全面遏制战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包括对华战略考虑、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外交（包括正面的利诱和负面的封锁）的启动、文化战略的推行、外交谈判的延续、以及情报部门、美国国务院“中国手”、美国亚洲盟国、美国国会、智库和左翼运动的作用等。

五、简短评论

外交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历史档案和文献的解读。它涉及到史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命题：从学理层面来看，历史研究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前者要求在解读档案时必须严格忠实于原文，后者则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再创造”。^[28]在美国和欧洲，甚至在我国国内，先提出理论假设，再通过解密档案加以实证研究的成果并非凤毛麟角，但大多数学者很难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假设与实证研究的严重脱节，甚至成为彼此孤立的“两张皮”，留下败笔。张教授长期潜心研究国际安全与冷战史。多年的学术积淀、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训练使张教授在理论研究和档案文本解读两个领域游刃有余，《再探》理论与实证有机地结合便是佐证。该书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它为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史学界加强学术交流、整合学术资源提供了参考。^[29]

除学理价值外，《再探》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总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重复着自己，冷战思维也不例外。伴随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政界、学界和传媒界不断滋生和发酵，影响着美国战略家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是否会在 21 世纪启动旨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张教授分析认为，中美结构性矛盾、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冷战思维、西方媒体的炒作、相应公共话语体系的出现、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上升是导致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抬头的重要动因。^[30]从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再探》不仅仅是在探讨历史问题或理论问题，而且是在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战略规律，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对中国外交亦具有借鉴意义。例如，为尽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领导人因势利导，及时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中美大大拓展了合作范围。^[31]相比之下，2008 年 8 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军事冲突后，美俄之间围绕高加索危机采取了刚性碰撞政策。新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否会从中国转向俄罗斯？美国的战略决策者是否会酝酿和执行旨在削弱俄罗斯综合国力和进攻性力量的

“新型遏制战略”？研究者或许可以从解读《再探》过程中受到启发，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注释：

- [1] See George C. Herring,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 See Ralph B. Levering, *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 [3] See Robert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4] See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 [5] See Thomas G. Paters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Lexington, Mass: Heath, 1974.
- [6] See Martin McCaule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Longman, 1983.
- [7]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另可参见张曙光：“拓展冷战研究——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
- [8]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引言，第IV页。
- [9] 系统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论著可参见 Stephen J. Cimbal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hoices and Limits*, New York: Estbourne, 1984.
- [10]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1—14页。
- [11] 在上述遏制手段中，张曙光教授提出的相互威慑理论（Mutual Deterrence）丰富了当今威慑理论。See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2]、[13]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7—8页；第28页。
- [14] 参见 John W. Spanier & Steven Hoo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8；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40页。
- [15]、[16]、[17]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28-31页；第66—67页；第86—87页。
- [18] Hans J. Morgenthau &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Delhi: Kalyani Publishers, 1985, p. 22.
- [19]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94页；第96页。
- [20] 参见 NSC-68, 7 April 1950, in Nelson Drew, *NSC-68: Forging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4；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19—120页。
- [21]、[22]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40页；第173—174页。
- [23] See Harlan Linneus McCracken, *Keynesian Economics in the Stream of Economic Though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24]、[25]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206-208页；第244-246页；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4.
- [26] See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 [27]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287—288页。
- [28] 张曙光：“浅谈美国外交文献的利用”，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
- [29]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张曙光：“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
- [30]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325—326页。
- [31] Chenghong Li,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ujia Guo and Shiping Hua, eds., *New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p. 203-232.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3月